

论纪庆曾对《明史》编撰的批评

崔 壮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 纪庆曾长于史学而深于明史,对清代官修之《明史》多所批评。他认为《明史》初修未及剪裁润色,复修又所用非人,持论虽不尽确切,却表达出其对修史诸臣命篇著述的不满。基于此,纪氏提出诸多具体的改撰意见,包括列传和表的删并,文字润饰以及史事的选择与铨配三个方面。其中不乏切中要害的真知灼见,体现了他在明史与传统史学领域的极高造诣。有些主张甚至可以视作历史编撰的一般法则,为已至穷途的旧史体添入几分新意。

[关键词] 纪庆曾;《明史》;史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0)05-0091-08

清代自官修《明史》刊刻颁布,治明史者,或鸠集史料,补撰南明三朝始末,如徐鼎之《小腆纪传》《小腆纪年》,倪在田之《续明纪事本末》;或以编年体重现有明一代之三百年兴亡,如陈鹤祖孙之《明纪》、夏燮之《明通鉴》、梅启照之《明史约》;而鲜有谋求以纪传体重撰或改撰者。黄云眉先生曾道:“《明史》一书,清代学者以其为钦定之故,率有褒无贬,或钳口不道,以远疑忌。”^[1]可谓一语中的。然亦非必无敢越雷池者,道光年间,魏源著《书明史稿》文二篇,表面上似针对王鸿绪《明史稿》而发,实则多中钦定《明史》之弊,又著《海国图志》更直指《明史》书中之讹误。纪庆曾对于《明史》亦颇多批评,并提出相应改修设想,较之魏氏,所议方面更广、要点更多。而魏源以其思想、学术大家之角色在各方面总能引人注目,早在1979年刘寅生先生便著有《魏源与晚清时期的明史学》一文,认为魏氏之评《明史》虽“不过寥寥数笔”,却“启发了人们注意到钦定《明史》不是十全十美的……为晚清时期的明史学研究开拓了园地”。^[2]纪庆曾之声名则远不能及,学界对其人之履历,其学之所及,皆不甚关注。惟近人邓之诚先生谓其“所论《明史》之失,全如隔靴搔痒”,所论改撰之法则过于拘泥古例,称:“盖修史有法而无定法,史贵纠集众事,事无定而法有定,马、班之法,岂能袭用于今世?刘知幾、郑樵工于诋呵古人,使自为之,亦未必无憾。”^[3]殊非公论。马班之法虽不可尽用于今,却也非无一可用于今。例如纪传体裁,不正是对马、班之书的袭用吗?盖纪氏之论虽得诸古,却不尽泥于古,其中真知灼见多有。今略述其生平与学术,更详阐其论《明史》编撰之语而平议之,以就教于方家。

一、纪庆曾的生平与学术

纪庆曾,字思谥,号半虔,又号师泉,浙江乌程人。少孤,由祖母抚育成人。入归安学,补增广生。家境极为贫寒,以授徒自给,然自许清高,“耻为求知干誉之文,遇知名士则走避”,尝曰:“学与我合则往,不然,宁与古人相对。”^{[4]22-24}金锡桂有诗咏之:“君憚朱门游,杜足甘陈编。”^{[5]10}又为族人所累,以至于大困。曾北游山东五年,非但无所遇,归而愈发窘迫。道光十五年以伤寒疾卒。在治学方面,纪氏博闻强记、思绪敏锐,沈垌谓之“强记过人,双眸炯炯,每朋侪会合时,笑语喧杂,辄起取架上书默视,俄顷已尽数卷,多能背诵”“识解绝人,论古今得失、儒术醇疵,口若悬河,闻者为之色骇”。^{[4]22}金诗亦云:“读书十行下,两目精光悬。约言释疑义,如冰方涣然。清文偶一作,如风鹤露蝉。浑浑掩群雅,渺渺汇百川。侪辈顾而愕,瑟缩无敢前。履絢之所到,问难倾四筵。矧予闻见眇,井底窥青天。”^{[5]10}由此可见其读书论学时之风采。除沈、金二人外,所交厚者还有张履、施国祁、盛朝勋、孙燮、沈登瀛等。然因为人之“隘”,著述无多,纪氏声名始终未能远播而局限于南浔学人的小圈子中。

[收稿日期] 2020-06-25

[作者简介] 崔壮(1991-),男,河北藁城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近现代学术史。

纪庆曾曾自述其学术追求道：

“盖天地万物之理备于六经，自日月寒暑之往来、山川之流峙，草木之华实，鸟兽虫鱼之变化，无不可与圣贤之言相证然。或求之过深，遂至束书不观，空言性命，有不流于释老之徒者希矣。百年以来学者始知好古，然徒于朔闰之乖违，舆地之沿革，官爵氏族之互异，考之不厌其详。若成已成物之道，知之者盖鲜。呜呼！是可谓穷经者乎？善学者不然，用力于物则民彝之大，而不遗训诂名物之细，博综于汉晋以来诸家之说，而必以程朱数大儒为之归。然后精思以探其奥，反身以践其实，斯为能尊经也已。”^{[6]742}

是为综合汉宋、由博返约之论，反映了道光学术的以践实、经世为宗旨的时代特征。沈垚曾对纪庆曾之为学次第与长短深浅有一个大体的认知：“初颇泛览，继乃潜思理学家言，然所长终在史，而明史尤深。”^{[4]22}查纪氏今存一卷之《叠翠居文集》，八十七篇诗文中，史论或具有史论性质者占近三十篇之多。其中《续明史杂咏序》云：

“予质钝于二十一史，读者仅五六家。惟钦定《明史》及王司农《史稿》读之稍详，于胜国治乱存亡之故，略能道其本末。洪武之创业似汉高帝，而综核过之。永乐之嗣绪似唐文皇，而武功则不及。惟宣德、洪治之守成，拟汉之文、宣殆无愧色。然大宁弃而肩背无藩篱之固，词臣相而殿阁多迂谬之士。正德以降，如日之下昃，犹延至百数十年而后亡，不可谓非幸也。听政荒则朝纲紊，门户盛则气节伪，厂卫专则人心思乱矣。意欲论其得失而才力限之，逡巡未敢下笔。”^{[6]747}

短短数语不仅勾画出朱明王朝的兴衰历程，而且历数其乱亡之故，即所谓由“大宁弃”“词臣相”“听政荒”“门户盛”“厂卫专”以至“无藩篱之固”“多迂谬之士”“朝纲紊”“气节伪”“人心思乱”，非邃深史学、洞悉事理者不能道。正是基于此种对明代历史及相关文献的熟玩深绎，纪庆曾对清代官修之《明史》在编纂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内涵十分丰富。^① 以下详论之。

二、关于官修《明史》的整体评价

纪庆曾认为：“国初修《明史》诸臣多于搜采考索上用心，未及剪裁润色；乾隆时重修，删改出方望溪之手，望溪于叙事雅非所长，详略颇未得宜。”这是对《明史》纂修前后两个阶段的简略评价，有得有失，当分别观之。

所谓“国初”当指顺治、康熙之际，时为《明史》创稿之最初阶段，必然需要在“搜采考索”上用心用力，尤其是面对异闻纷出的建文朝与缺乏实录依凭的崇祯间史事，非搜采广博、考证精核必无以去伪存真、昭其信实。一度任《明史》馆总裁官的徐元文曾上《请购明史遗书疏》道：“撰次史书，惟凭载籍，今胜国文献日就湮没，使非广购遗编，安能讨论尽善？……购采书籍，实史馆第一要务。”^[7]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二书》亦云：“史馆急务，莫先于聚书……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诂可止据《实录》一书，遂成信史也邪？”^{[8]402}可见，欲修史，先聚书，正是当时学者的共识。

以布衣之身参与修史的万斯同对于“务博求信”的撰述宗旨更有深刻的认知：

“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并暗昧而不明，由无迂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9]51-53}

万斯同所言是何等的沉痛与无奈！修史者何尝不知“事信言文”方可为传世之作，只是面对偷惰已久之世俗，面对“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的著述风气以及由此风气而成之史料文献，便不得不将精力更多侧重于“事信”的追求，而对“剪裁润色”有所轻忽。早在晚明时，有志国史撰述的王世贞就对当时史学的弊端有清醒认识，所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的论断已成为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名言。^[10]日后张岱著《石匮书》，在自序中更是因此痛道：“有明一代……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11]由此愈可见到，在以“简”为上的史学评断标准面前，万氏的“务博”且“先为之极”做法的可贵之处。

《明史》纂修至雍正十三年已基本告竣，至乾隆时，仅“恐其中尚有舛误之处，著展半年之期，该总裁率同

^① 纪庆曾的相关见解俱见于沈垚所撰《纪思谥事略》，盖为沈氏以为珍言，且足见纪氏学之所长，遂不厌其烦而录之。该文载沈垚：《落帆楼文集》卷4，第22—24页。以下凡引此文，概不另注。

纂修官再加校阅,有应改正者即行改正”^[12]而已。至乾隆四年,全书刊刻完毕,并无“重修”之事。且方苞曾因戴名世《南山集》史案险受诛连,虽一度为世宗宽赦,而乾隆四年高宗又因所谓“营私”迹象而旧事重提,^[13]对其严加申饬,可见史案一事对其一生的深刻影响,清廷岂有用之与修《明史》之理?纪昀曾谓“乾隆时重修,删改出方望溪之手”,显然不是事实。我们知道万斯同《史稿》在其歿后落入王鸿绪之手,并被其删改而成为《明史》最后之纂修的底本。那么,方苞有没有可能参与王氏的修订工作呢?据方氏所撰《万季野墓表》,文中提到万斯同曾以《明史稿》文事相托,而事实上至“戊戌夏六月,卧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志之”以成此《墓表》时,“其史稿及群书不知所归”,“于所属史事……未获从事”。^{[9]54}“戊戌”当为康熙五十七年,而王鸿绪已在康熙五十三年进呈列传稿二百五卷,可见方氏并未参与其中。

至于纪昀曾“望溪于叙事雅非所长”之论,似乎已无讨论的必要。但这之中所暗含的文史之辨的意蕴,却需要作些阐发。该观点体现了纪氏作为史学者的敏锐感觉与卓越判断,绝非其一人之独论。乾嘉年间,同样在史学方面甚有见地的学者章学诚已对方氏显露微词:“方氏不过文人。”言语之间充斥着鄙夷的味道。因为在章氏看来,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史家之文是截然不同的类型。他继续发挥古代史家“文人不能修史”的论调,指出:“仆论史事详矣……至于文辞不甚措议。盖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譬之品泉鉴石,非不精妙,然不可与测海岳也。”文人见解多逐于“文辞之末”,多“私矜一家机巧”,不晓史家“陶冶群言”之法,更不知“《春秋》、马、班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才是古文辞的正源。^{[14]325-1034}所论正中文家议史的弊端。这里并无意否定方苞作为文学大家的成就与地位,只是借由章氏的史文理论,来阐明纪氏断而未论的史家视角中有关文史界限的理念。

三、关于传与表的删并意见

自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史书,就处处体现出史家在篇目设置与内容铨配方面的别识心裁,诸如世表、年表、月表的递进设置,以及孟荀与邹衍、老庄与申韩、屈原与贾谊的合传共篇等等,无不后世所称道。这种对历史进程的独特把握、对学术源流的透彻理解以及对人文情怀的浓郁抒发,正是使《史记》得以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内在驱动。可以说,和史料的搜集与考证相比,编次与命篇才是更高层次的编纂行为,才能更加充分地体现史家的史识与才学。纪昀曾对《明史》的主要批评与改修设想就是由此展开的。

关于列传,纪氏提出十条具体意见。分别是:

- (一)议礼诸臣用《汉书·韦贤传》体,尽载入《杨廷和传》。
- (二)齐、楚、浙三党诸小人用《后汉书·党锢传序》体,撮其大略载入东林诸君子传。
- (三)温体仁之党事皆入《体仁传》。
- (四)熊文灿之事即入《杨嗣昌传》。
- (五)崔呈秀、魏广微之事即入《魏忠贤传》,而刻酷摹写其上寿颂阉之状。
- (六)明代气节与东汉类,东汉诸臣章疏史不尽载,其事或见本纪,或散见他人传中,《明史》叙直谏诸臣亦当如此。
- (七)土司不必立传,可入《地理志》。
- (八)治河诸臣事入《河渠志》。
- (九)边将无赫赫显功者,事入《外国传》。
- (十)《王文成传》事功与讲学杂见一篇之内,文终不纯,当于本传中详载事功,而列其论学之指于《儒林传序》。

第(一)条意见是欲仿效《汉书·韦贤传》来集中安排处理明代“议礼诸臣”的相关史事。我们知道,《韦贤传》不仅重点记述了韦孟、韦贤、韦玄成三人的生平事迹,更为重要的是在韦氏传后,附录了西汉一代尤其元帝以降至平帝的有关立庙、毁庙的言论与事实,堪称一篇简明扼要的“西汉庙议史”。其中所载贡禹、韦玄成、许嘉、尹更始、匡衡、孔光、何武、刘歆以及王莽等人的奏议,主要涉及罢郡国庙,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毁亲尽之帝庙(如太上皇、孝惠、孝景庙),立不毁之祖宗庙(太祖、太宗、世宗庙)等问题,尤为后世治汉史者所珍视。所谓明代之“议礼诸臣”,当指参与世宗朝“大礼议”的众多人物。“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正德十六年,武宗暴卒而无嗣。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与慈寿皇太后议定,迎孝宗之弟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世宗。此后,围绕如何定义世宗与孝宗、世宗与生父兴献王的关系,如何尊称世宗亲生父母,君臣之间、朝臣之间进行了诸多博弈,表面上是礼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则推

动了政治权力的转移以及政治秩序的重塑。在这一事件中,定策迎立世宗的杨廷和却始终处于世宗的对立面,并最终成为失败者。《明史·杨廷和传》仅载杨氏议礼之言行,以作为导致其与世宗势成冰炭的因素之一。纪庆曾由《汉书·韦贤传》得到启发,欲将“大礼议”之始末录于传文之后,既不破坏杨传的整体性,又能在列传之中存重要事件之始末,以稍去纪传体史书“一事而复见数篇”的弊端,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史体革新的尝试。

第(二)条也是一种欲于列传中存纪事本末之体的意见。东汉与明代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确实存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宦官专权与党锢之祸乃最为人易见者。《后汉书·党锢列传》是史传中的名篇,其传前序文纵论周秦两汉风俗气节之变迁,毕载数次党锢之始末,表达对“正直废放,邪枉炽结”之局势的愤慨,对“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之“抗愤匹夫,横议处士”的赞颂与同情,为正文列传部分的撰述作足了理论与史实的铺垫,更埋下了史家抒发情感的基调。^[15]《明史》列传虽无直标“党锢”为题者,却不乏合传东林诸君子之篇,如《列传一百十九》之载顾宪成、顾允成、钱一本、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等,《列传一百三十一》之载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高攀龙、冯从吾等。其中《列传一百十九》篇末赞文称:“宪成诸人,清节姱修,为士林标准。虽未尝激扬标榜,列‘君’‘宗’‘顾’‘俊’之目,而负物望者引以为重,猎时誉者资以梯荣。”^{[16]6055}是修史诸臣已将东林君子与东汉“党人”相比拟。若《明史》果能如纪庆曾所言仿《后汉书·党锢传序》体,撮齐、楚、浙三党倾轧东林人之大略以入《明史》东林诸君子传,相信不仅可使传文平添几分光彩,读史者于史事也将更加明悉。

其下第(三)(四)(五)条,本着“类族辨物”“因事命篇”的原则对各传进行重新组合,均属有见,当无可非议。第(六)条基于“明代气节与东汉类”的认知,主张仿《后汉书》将直谏诸臣的事迹散编入本纪或他人传中,既得以保存史事,又可以展现明代历史的特征,表彰“气节”。第(七)(八)(九)条,意在使“篇目省而文体不破碎”,则得失参半。省《土司列传》入《地理志》与省治河诸臣事入《河渠志》,颇嫌昧于传、志体裁之别。早在《明史》初修时,朱彝尊便有“至于土司之承袭,顺者有勤王者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制,则不能著其人”的议论,可以说考虑得极为周详。^{[8]401-402}至于“边将无赫赫显功者,事入《外国传》”,则不失为削繁删冗的良策。

第(十)条是对《王守仁传》之归属问题的继续讨论。在近百年的《明史》编纂史中,关于是否设立《道学传》与《儒学传》并立为二,以及如何处理王守仁及其弟子的传记,学者们纷争不断,各有立场,常有门户之见、意气之争麇杂其中。^①《明史》最终不立《道学》,《王守仁》独出为大传,其弟子事功不显者则入《儒林》,颇有平息争端的用意。然而这样的做法,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王学之师弟授受、学术渊源由此而晦暗不明。《明史·儒林列传序》述明代儒学之沿革道:“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16]7223}《儒林列传一》专收承朱子遗教学人,《儒林列传二》则主收陈、王二派学者,体现了撰者对明代学术的历史认知与优劣判断。不过,其述陈学由《陈献章传》开端领衔,而论王学却未及立派开宗,但叙弟子承学,殊失为史之意趣。纪庆曾“于本传中详载事功,而列其论学之旨于《儒林传序》”的一分为二的主张,便是出于对此缺憾的弥补。

此外,纪氏对《明史·宰辅年表》与《七卿年表》的设置也提出一点意见。史书篇目的制定,需要因时而宜、因事而设,以此充分反映历史的阶段性特征,表的设置也不例外。朱彝尊所谓“历代之史,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8]401}正是此意。《明史》中设有《七卿年表》,章炳麟将之与《新唐书》之《方镇表》《清史稿》之《疆臣表》并举,谓为“增设而得当者”。^[17]而纪庆曾却认为:“明初政事归六部,其时六部即宰辅,嘉靖后阁臣始以宰相自居。史臣以阁臣为《宰辅表》,别以六部及督察院为《七卿表》,不合一代制度,不若陈东庄合殿阁部院诸大臣作一表为善。”所言实根于对明代政制变迁历史的理解,可谓有理有据的不刊之论。纪氏所树为依傍之“陈东庄”,应指陈黄中。陈氏字和叔,号东庄谷叟,吴县人,曾著《宋史稿》二百九十卷,颇为钱大昕所称。^[18]据彭绍升《陈和叔传》载,其撰有《殿阁部院年表》。^[19]此外,明末学者许重熙已有《国朝殿阁部院大臣表》十六卷之著,万斯同襄助徐元文修纂的《明史稿》亦有《大臣年表》之篇,只不过日后为王鸿绪私自改作《宰辅》与

① 关于《明史·王守仁传》归属之争论,可参见段润秀:《〈明史·王守仁〉编纂考论》,《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第83—85页。

《七卿》二篇，^[20]才有今日《明史》之最终本。以许、陈、万、曾之史识观之，^①颇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纪庆曾有关传、表改撰的一些设想，大都是基于明代历史的核心议题提出的，诸如“大礼仪”、党争、宦官专权、士大夫气节、土司、治河、边事、王学以及政体沿革，无不是关乎明代国运、体现历史特征的大问题。纪氏之史识，由此更见卓绝。

四、关于文字润饰的批评

前已论及纪庆曾对《明史》“剪裁润色”之微词，他还有更为具体的批评，曾将《明史·王之案列传》与《史记·淮阴侯列传》《元史·泰定帝本纪》的部分内容作比较，指出：“《史记》载淮阴侯与陈豨步庭语何等神采，案牍原文必不如是，只是史臣善改饰耳。《王之案传》直载张差供语，不为改润，殊非文辞行远之道，将与《元史·泰定纪》同讥矣。”这是认为史家撰史不可直接因袭案牍原文，而需有所“改润”，才能使所著广泛流传而不被湮没，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明史·王之案列传》载：

“之案值提牢散饭狱中，未至差，私诘其实。初言‘告状’，复言‘凉死罢，已无用’。之案令置饭差前：‘吐实与饭，否则饿死。’麾左右出，留二吏扶问之。始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遇人辄打死，死了我们救汝。’畀我枣木棍，导我由后宰门直至宫门上，击门者堕地。老公多，遂被执。’之案备揭其语，因问达以闻。”^[16]6343—6344

文中“小名张五儿”以下至“老公多，遂被执”一段即“张差供语”，与前后行文相比，更多几分粗俚，纪氏以为未经改饰之“案牍原文”，当非妄断。将与此“同讥”的《元史·泰定帝纪》，盖指所载泰定帝登极诏：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刺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21]

该文由蒙语直译为汉语白话文，单从文字表述上来看，可以说陋劣不堪，足见明初修史诸臣之荒率程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泰定帝的登极诏书，已被后世从事语言史研究的学者视若珍宝，其价值恐怕远胜浸润着古色古韵、文采奕奕的译文。

与《元》《明》二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记》所载淮阴侯与陈豨步庭语，备引如下：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22]

这一段文字果如纪庆曾所叹神采斐然。实际上，这决非史家仅仅润饰“案牍原文”所能得来的。陈、韩携手“辟左右……步於庭”，如此密谋，他人缘何得之？文章叙写得如此生动，将“无韵之《离骚》”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想来必是史家掺入故事、传说元素，并充分发挥想象予以叙写的产物。然则其诗耶？史耶？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司马迁是以一种诗的手法与情怀补写了史料未能切实支持的历史场景，其结果并非诗性遮蔽或破坏了史性，而是诗性统合并熔炼了史性。虽然司马迁并未亲耳听到陈豨与韩信的庭间交谈，但任何人不能矢口否认历史果真如是的可能。于是《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在廿四史乃至在史学史中的地位，远非《元史》《明史》所能望其项背的。

那么如何看待纪庆曾的批评呢？实际上，纪氏所要证明的是史家有必要对“案牍原文”进行改饰的观点，而从《史记》所据并非案牍文书这一点来看，其论述显然失之妥当了。可以说，无论是在史料来源与史料观念、修史体制与修史方式领域，还是在求真理念与文学追求方面，《史记》与《元》《明》二史完全是两个不同史学时代的作品。《史记》的叙事经验，至少纪氏所举之例，并不适用于其所讨论的话题。至于案牍文之改饰问

^① 关于许重熙这位长期为人所淡忘的晚明史家之生平与学术，可参见钱茂伟：《许重熙：一个值得重视的晚明史家》，《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16—120页。

题,在纪庆曾之前,已有不少相关言论。如《史通·言语》篇所论便大有振聋发聩之效: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23]139-140}

刘知幾讽刺了那些不顾“氓俗递改”“岁时不同”而一味“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的撰史者,虽然并不完全针对案牘文的修饰问题,但其提出的在撰述语言方面应基于“天然”“从实而书”的原则与标准,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审视纪氏之命题。还需要指出的是,刘知幾并不排斥修饰语言,尤其是“终不失其梗概”的“讨论润色”,他反对的是不问今古、不辨真伪的“华而失实”。^{[23]139-140}

章学诚亦尝论历史语言之“化裁”道:“古语不可入今,则当疏以达之;俚言不可杂雅,则当温以润之。辞则必称其体,语则必肖其人。质野不可用文语,而猥鄙须删;急速不可以为宛辞,而曲折仍见;文移须从公式,而案牘又不宜徇;骈丽不入史裁,而诏表亦岂可废!”^{[14]405}和刘氏的主于攻讦不同,章氏主于建设,所关注的面也更加宽广,不仅注意到古今之别,而且论及俚雅、质文与急宛几对风格,以及文移与骈丽两种文体的入史问题,提出“辞称其体,语肖其人”的书写准则。更为可贵的是,他并非将两种相对风格视作绝不相容,而是试图去抓住它们浹洽相融的可能空间。纪庆曾好友沈垚则直接就“案牘入史”一事发表了看法:“今日河渠水利之书连篇累帙无非吏胥案牘语,而水之源委脉络,地之向背高下,虽寻绎数四,仍不得端绪。甚者且至虚字不通,其故由欲便俗适用,取案牘一切尽载之,而不知改削故耳。以今日之案牘而不改易,虽司马迁、班固复生,亦不能成佳志。”^{[4]15-16}前引章氏文已提出“案牘不宜徇”的观点,沈垚本着他对案牘文之鄙劣程度的深切了解,更进一步指出案牘入史之“改削”的必要性。当然,沈氏针对的是书志,不需要考虑“言如其人”的问题,便也不必纠结于雅俚古今之辨。

至此,我们再来看纪庆曾的批评。《明史·王之案传》中直录张差供语,殊不知口供的记录本身便已是一种修辞。同样地,《元史·泰定帝纪》直载蒙文诏之汉语白话译文,又殊不知翻译本身也已包含了修饰的成分。修史者不知就其人、其境而重加改写,多思润饰刊削,反因袭直录啰嗦蹙脚、鄙陋不堪之供语与译文,宜乎其为人所讥,为纪氏所斥。纪庆曾并未详说如何改润案牘原文,抑或沈垚失记,毕竟“文辞行远之道”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但他既将《史记》传文视作经典与模本,足见心中充满了对史家个人之创造的期许。历史撰述不是史料累积,因袭案牘原文固然可以为后世存留部分珍贵文献,但在获得史料价值的同时,便也失去了作为史学以“行远”的前景。

五、关于史事选择与铨配的见解

撰一代之史,史事的选择与铨配相当关键,格外考验史家的眼光。一人之事,有大有小;不同人事,有多有少。应如何处理,前者面对的问题多是史事的选择与笔墨的分配,即记与不记,略叙与详叙;后者面对的主要是篇目的设置,设传与否,主传抑或附传,大传抑或类传。纪庆曾就此有两条具体的批评,很能道中要害,引人深思。其一云:

“古人为名臣作传,叙大事不惜数千言,而小事则略,读《霍光传》可见。后代史官无识,小事一概采入,反将大事删节字句以为简,于是间世名臣黯然无色矣。《于忠肃传》了无可观,当删去其小事,而铺张其大事。”

于忠肃即于谦,是明代中期拯救危亡的名臣。纪氏以《于谦传》与《汉书·霍光传》相比,指出二者在大事小事之处理方面的差别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后果,一者光彩耀人,一者黯然无色。其实对于大事、小事的书写方式,在史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先秦时期就有所区分,杜预《春秋序》云:“《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24]这里的“策”与“简牍”不同书写载体的差别,暗含的便是详“大”略“小”的做法。不过在史传中,对于个人的塑造大事固然重要,小事也非一概可弃。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之述垓下别姬,《高祖本纪》之写归乡吟歌,《李斯列传》之叙斯见“厕中鼠”与“仓中鼠”事,对于帝王将相来说,无非小事,却无不深刻着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观纪氏所赞许之《霍光传》,未尝没有小事的点缀,如载:“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25]事虽微末,却适由之见霍光为人。而

览《于谦传》，此种“小事”衬托的缺少，正是致使文章寡淡无味、了无生气的原因之一。

不过，与《霍光传》相比，《于谦传》最大的差距并不在“小事”上，而在“大事”之“铺张”。《霍传》以主要笔墨叙写昭宣更嬪之际的废立事件，通过众多人物语言和神情的摹写，丰富细节的描绘，紧张氛围的营造，将霍光掌控朝局、左右人心而又小心谨慎的权臣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刘师培曾以此文为“有活跃之气”的代表，并就其中的两处细节谈到：“前叙太后所著之衣服，继叙宣读诏书，而将太后之言插于其中，当时之情态即栩栩欲生。”^[26]再看《于谦传》，全文诸事连缀，而文气萎靡，文笔呆滞，叙一代名臣之诡谲人生，几无波澜起伏之感。若于谦在国家危难之际、千钧一发之间，力排众议、拥立郕王、坚守京师、抵御外侮的标志性大事，也没能写出风采，纪氏称之“了无可观”，可谓恰如其分。

其二云：

《汉书》不立“纪信传”，后代史官标忠义之目，而史愈下。当取《忠义传》事多者入列传，余改为表。列女亦为表。表多而传少，斯事备而文可读。

上文已述纪庆曾主张“边将无赫赫显功者，事入《外国传》”，以救列传篇目繁多破碎之弊。这里又提出设表以处无事或少事之人的方法，救弊的用意是相同的。

在纪氏之前，章学诚已经认识到人表作为一种史学体例的特殊价值，指出后世正史列传“日出日繁而不可简料”，^{[14]510}正是不用“人表”的结果。他在对顾炎武“（年）表废而列传遂繁”观点的商榷中，进一步讲道：

“昔亭林顾先生之论史……谓表废而列传遂繁，其言良允。然顾氏……未尝知人表之陷于众谤，宜急为昭雪，而当推为史家之法守也。充顾氏之所议……唐、宋、金、元诸史，俱有年表，何以列传之繁，反比范、陈、沈、魏无表之书增至数倍？则顾氏表废传繁之说，不足以为笃论，而小子争复人表之说，非好为异论矣！”^{[14]746}

纪氏之后，梁启超继章氏之遗绪复“争复人表”，甚至将“人表”作为“人的专史”撰述的重要体裁，视为“很大的宝贝”：

“人表的体裁，始创于《汉书·古今人表》……后来史家非难的很多，章实斋则特别的恭维，以为篇幅极少而应具、应见的人皆可详列无遗。我们看来，单研究汉朝的事迹，此表固无用处，但若援引其例，作为种种人表，就方便得多……我们认为是很大的宝贝。章实斋先生主张扩充《汉书·古今人表》《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用意，作为种种表，凡人名够不上见于列传的，可用表的形式列出。‘人名别录’亦即可以为其中的一种。章氏所著几部志书，人表的运用都很广。所以人的专史，人表一体亦很重要。”^[27]

这样，从章学诚到梁启超，从旧史学之集成者到新史学之开创人，将“人表”的功能与意义阐发得殆无遗蕴。纪庆曾处于章梁之间，能够在传统史法陈陈相因、百弊丛生之际而生发救弊之念，进而认识到“人表”与列传以及整部史书的关系，揭示出“表多而传少，斯事备而文可读”的整体撰述设想，无疑是极为难得的。

六、结 语

纪庆曾长于史学而深于明史，他批评清初修史诸家太过重于“搜采考索”，又臆断方望溪“叙事雅非所长”，故其评官修《明史》，一改乾嘉时代古文家以文论史、考史家以经学治史学之积习，真正从史家的立场谈编纂的问题。他认为《明史》初修未及剪裁润色，复修又所用非人，持论虽不尽确切，却表达出其对修史诸臣命篇撰述的不满。基于此，纪氏提出诸多具体的改修意见，包括列传和表的删并，文字润饰以及史事的选择与铨配三个方面。其中不乏切中要害的真知灼见，体现了其在明史与传统史学领域的极高造诣。有些主张甚至可以视作历史编撰的一般法则，为已至穷途的旧史体添入几分新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纪氏的见解大多还是从由早期史学经典中参悟得来，依旧不免传统学术执本济末的老套路和老味道。这种局限于传统史体格局之中的小修小补，根本无法持挽史学衰败的大潮。在中国史学拾遗补阙、旧体新撰已经接近饱和的十九世纪，真正的革新似乎难以在传统学术内部自行解决，于是一场裹挟着异域因子的史界革命在二十世纪初年应运而生。纪氏改修《明史》的主张在其生时未能付诸实践，在其身后也终于沉没在学术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至今未能听见回响。传统史学需要进行现代转换，叙事史学之复兴更加需要传统资源，纪表志传体裁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学创造不应被彻底放弃。在这样的语境中，纪庆曾对《明史》编撰的批评完全值得重新审视。

[参 考 文 献]

- [1] 黄云眉. 史学杂稿订存[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111.
- [2] 刘寅生. 魏源与晚清时期的明史学[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79(3): 83—89.
- [3] 邓之诚. 桑园读书记[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37.
- [4] 沈垚. 落帆楼文集(卷4)[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年影印吴兴丛书本.
- [5] 金锡桂. 十忆诗·纪半度庆曾[M]//周庆云辑《浔溪诗徵》卷39. 民国五年梦坡室刊本.
- [6] 纪庆曾. 叠翠居文集·拜经图记[M]//丛书集成续编133册[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年影印适园丛书本.
- [7] 徐元文. 舍经堂集(卷18): 请购明史遗书疏[M]//续修四库全书1413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影印本: 618.
- [8] 朱彝尊. 曝书亭集(卷32)[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7.
- [9] 方苞. 方望溪文[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 [10]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20): 史乘考误自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61.
- [11] 张岱. 琅嬛文集(卷1): 石匱书自序[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6: 1.
- [12]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庚辰”: 清实录9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影印本: 333.
- [13]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2)“乾隆四年五月戊午”: 清实录10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影印本: 416.
- [14] 章学诚著, 仓修良编注.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 [15] 范曄. 后汉书(卷67): 党锢列传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185—2187.
- [16] 张廷玉. 明史(卷67): 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7] 章太炎. 章太炎国学二种[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184.
- [18]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卷28): 跋陈黄中宋史稿[M]//嘉定钱大昕全集9.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6: 453.
- [19] 彭绍升. 陈和叔传[M]//祝秀侠, 袁帅南编《清文汇》. 台北: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60: 1497.
- [20] 杨椿. 《孟邻堂文钞》卷2《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M]//清代诗文集汇编238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62.
- [21] 宋濂. 《元史》卷29《泰定帝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638—639.
- [22] 司马迁. 《史记》卷《淮阴侯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628.
- [23] 刘知幾著, 浦起龙通释. 史通通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39—140.
- [24] 杜预. 春秋序. 载《春秋经传集解》卷首[M].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1.
- [25] 班固. 汉书(卷68): 霍光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933.
- [26]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20.
- [27]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85.

(责任编辑: 闫卫平)

On Ji Qingzeng's Comments on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CUI Zhu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Ji Qingzeng, who was adept at historiography,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had lots of comments on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He held the idea that the writers didn't have time to polish the book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writing period, and chose the wrong person in the revising stage. His idea may not be accurate enough, but it expressed his displeasure. Ji put forward many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book, including the deleting and merging of biographies and lists, the polishing of articles and the se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Among them, there are quite a few penetrating views that show Ji's great attainments. Some sugges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general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 adding new ideas to the old historical style.

Key words: Ji Qingzeng; The History of Ming; Historical comment